

《论衡》的海洋论议与王充的海洋情结

王子今

摘要 《论衡》作为汉代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名著,内容丰赡,视野宏阔,思辨精深,论说明朗。其中,涉及海洋的内容,以越人重视海洋开发的传统为基础,亦以战国秦汉时期海洋探索及早期海洋知识积累为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价值;涉及海洋气象知识、海洋水文知识、海洋生物知识的论说,亦开启了我们认识汉代海洋学的视窗。而作者王充因出生与长久居留地方的滨海环境生成的海洋情结以及体现出的开放、进取和重实学的海洋意识,也值得予以总结和说明。考察汉代的海洋文化,不能忽略《论衡》这部著作,也不能忽略王充这位思想家。

关键词 王充;《论衡》;海洋情结;海洋意识;海洋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3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19)05-0083-13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10XNL001)

王充著《论衡》,成就了体现东汉时期思想文化丰收的代表作。作为汉代文化史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亦形成深刻影响的名著,《论衡》内容丰赡,视野宏阔,思辨精深,论说明朗。《论衡》中涉及海洋观察乃至海洋开发之有关鱼盐经营、航运实践、地理知识、神秘信仰等方面的内容,以越人重视海洋开发的传统为基础,亦以战国秦汉时期海洋探索及早期海洋知识积累为文化背景,具有值得重视的价值。有些认识,来自亲近海洋的自身体验和具体感觉。《论衡》书中涉及海洋气象知识、海洋水文知识、海洋生物知识的论说,开启了我们认识汉代海洋学的一扇视窗。《论衡》作者王充的海洋情结以及体现出的开放、进取和重实学的海洋意识,也值得予以认真的分析、总结和说明。秦汉社会有关海洋的理念显现了体现出时代意义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海洋开发曾经取得空前的成就^[1]。考察和分析汉代的海洋文化,理解并说明汉代的海洋文化,不能忽略《论衡》这部著作,也不能忽略王充这位对海洋予以颇多关心,亦对海洋具有较多知识的思想家。

一、“负海”“浮海”体验:越人的远航能力与海洋情感

王充《论衡》在政治论说中经常用“海”以为比喻。如《论衡·须颂》:言“圣世”“圣主”其“德”“大哉”,又言“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以“海”为喻:“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于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2](P850)《论衡·定贤》关于“衰乱之世”政治识见的讨论中,也说到“海”:^[2](P1111)他在讨论认识论的规律时言“大”“小”,以“海”之“大”与“沟”之“小”对比。而所谓“浮于海者,迷于东西”,似是亲身经历航海实践获得的体验。《淮

南子·齐俗》写道：“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①[3] (P352)《淮南子》所谓“不知东西”之“惑”，即《论衡》所谓“迷于东西”。又《论衡·说日》写道：“盖望远物者，动若不动，行若不行。何以验之？乘船江海之中，顺风而驱，近岸则行疾，远岸则行迟。船行一实也，或疾或迟，远近之视使之然也。”^[2] (P500) 有这种“顺风而驱，近岸则行疾，远岸则行迟”的感受，并经思考，得到“或疾或迟，远近之视使之然也”的认识，应当也是通过“乘船江海之中”的航行实践获取的心得。所谓“何以验之”，明说这一知识来自“船行”海上的亲身体验。

《文选》卷二八谢灵运《会吟行》：“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李善注：“《汉书·地理志》曰：‘吴地斗分野。’《论衡》曰：‘天晏列宿炳矣。’晁错《新书》曰：‘齐地僻远负海，地大人众。’宋衷《易纬注》曰：‘天文者谓三光，地理谓五土也。’吕向注：‘星纪吴之分野，故云‘列宿炳天文’。炳，明。负，背也。言后背海水横镇于地理。”^[4] (P527) 所谓“《论衡》曰‘天晏列宿炳矣’”，今本《论衡·超奇》作“天晏列宿焕炳”。谢灵运“列宿炳天文，负海横地理”语，注家引《论衡》解释“列宿”，而“负海”其实是《论衡》作者王充出生与多年生活的“地理”背景。

所谓“负海”，言背靠大海，是战国秦汉时期人们指说滨海地方的习用语。《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齐，负海之国也。”^[5] (P2294)《史记》卷七八《春申君列传》：“（齐）东负海。”^[5] (P2392)《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载录汉武帝语“齐东负海”^[5] (P2115)。对于秦政的批判，常见涉及滨海地方经济政策的“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颍、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之说^[5] (P2954)。或言“转负海之粟致之西河”^[5] (P3085)。《汉书》卷二七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上》：“秦大用民力转输，起负海至北边。”颜师古注：“负海，犹言背海也。”《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所谓“募发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转委输兵器，自负海江淮而至北边”，“负海江淮”的说法突破了“齐地负海”的认识，体现“负海之郡”“负海之国”已经不限于齐地，而扩展至于“江淮”地方。“负海江淮”的说法又见于《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6] (P1447, 1143, 1660, 1517, 4121) 而《后汉书》卷一八《陈俊传》：“诏报曰：‘东州新平，大将军之功也。负海猾夏，盗贼之处，国家以为重忧，且勉镇抚之。’”其中“负海”与“东州”对应，“负海”所指即东部滨海地方。陈俊以军力平定“镇抚”“青、徐”“东州”，包括琅邪、赣榆、胸等地。李贤注引《华峤书》写道：“赐俊玺书曰：‘将军元勋大著，威震青、徐，两州有警，得专征之。’”^[7] (P691) 可知此所谓“东州”“负海”地方，指“青、徐”“两州”。而《续汉书·五行志二》言黄巾暴动致使“役起负海”，由黄巾军“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发”^[7] (P3297) 推想，“负海”所指空间区域可能更为广阔。

王充出生与长期生活的会稽地方，也是“负海之郡”。这里曾经是越文化的重心区域。越人在航海能力方面的优势，有悠远的历史记忆。

宋黄瑋修、陈耆卿纂《嘉定赤城志》卷三九《遗迹》“古城”条：“在黄岩县南三十五里大唐岭东。外城周十里，高仅存二尺，厚四丈。内城周五里。有洗马池、九曲池。故宫基十窰一十四级。城上有高木可数十围。故老云即徐偃王城也。城东偏有偃王庙。”^[8] 宋胡榘修、方万里纂《宝庆四明志》：“徐偃王庙在东。地名翁浦，俗呼为城隍头。《十道四蕃志》云：徐偃王城翁洲以居，其址今存。按史记载偃王之败，北走彭城武原东山下以死。疑非此海中。而韩文公为《衢州庙碑》，乃记曰：偃王之逃战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弃玉几研于会稽之水。则《十道四蕃志》或可信矣。”^[9] 徐偃王故事北则彭城，南则会稽，其实是体现了沿近海航运的实力的。越人“引属东海”，较早掌握了航海技术，号称“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10] (P57, 58)。吴王夫差曾“从海上攻齐，齐人败吴，吴王乃引兵归”^[5] (P1473)。这一海上远征的历史记录，是吴越人共同创造的。夫差与晋公会盟于黄池，“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

①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文典谨按：《文选》应休琏《与从弟君苗君胄书》注引，作‘见斗极则晓然而寤矣。’”

海沂淮以绝吴路”^[11] (P604)。所谓“沿海沂淮”,利用了水军优势。越徙都琅邪,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航海行动,“从琅琊起观台”,“以望东海”,其武装部队的主力为“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据说“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为桴”^[10] (P62)。越国霸业的基础,通过近海航运能力方面的优势得以实现。其军称“大船军”,航海工具称“桴”,称“楼船”,称“君船”^[10] (P63)。而私家长距离近海航行的史例,则有范蠡在协助勾践复国灭吴后“浮海出齐”的事迹^[12]。

王充“博通众流百家之言”^[7] (P1629),不会不了解有关越人海洋探索与海洋开发的历史记录。王充作为浙江上虞人,生于斯长于斯,且长期居“乡里”“教授”“论说”^[7] (P1629),无疑会受到家乡亲近海洋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影响,极有可能亦亲身参与过海上航行。史称王充“异人”,《论衡》“异书”^[7] (P1629),认识与理解其人其书,不应忽略其所居滨海地方之生存环境与文化传统的作用。

二、海洋史记忆:秦始皇“望于南海”与汉景帝“削之会稽”

会稽作为越国与吴国多年经营的滨海重心城市,与齐地南北对应,成为东方大陆生民海洋探索的另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亶洲在东海中,秦始皇使徐福将童男女入海求仙人,止在此州,共数万家。至今洲上人有至会稽市易者。吴人《外国图》云亶洲去琅邪万里。”^[5] (P247-248)在与“东海”方向包括“市易”的海上交通往来中,“会稽”与“琅邪”具有彼此相当的地位^[13]。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政权秦王朝建立之后,最高执政集团对新认识的海疆予以特殊的重视^[14] (第11版)。秦始皇出巡海上,在齐地沿海多有非常表现,又曾亲至会稽,“望于南海”。《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从,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海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司马贞《索隐》:“望于南海而刻石。三句为韵,凡二十四韵。”张守节《正义》写道:“此二颂三句为韵。其碑见在会稽山上。其文及书皆李斯,其字四寸,画如小指,圆镌。今文字整顿,是小篆字。”^[5] (P260, 261)会稽地方为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最后一次出巡所行历。会稽刻石的内容与文字,也是秦始皇出巡刻石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文化遗存。而“望于南海”字样尤其醒目。秦始皇“南海”置郡,对于中国海洋史及南洋交通史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此“望于南海”之所谓“南海”,当时其实是说东海。

王充颇看重秦始皇巡游海上又至于会稽的历史行迹。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多次回顾这一史事。《论衡·书虚》写道:“当二〔三〕十七年,游天下,到会稽,至琅邪,北至劳、盛山,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台,始皇崩。”^[2] (P200-201)《论衡·实知》又说到秦始皇的此次巡行:“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浮江下,观籍柯,度梅渚,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狭)中度,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刊颂,望于南海。还过,从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2] (P2071-2072)秦始皇“到会稽”“上会稽”及此后“并海”“旁海”的行程,回叙相当具体。

西汉帝国成立,最高执政者对于起初放弃沿海郡国控制权的情形有所反省。“削藩”即夺回诸侯王国对诸多地方统治权力的政治动作,以沿海地区为重心。于是,另一体现出海洋意识的涉及“会稽”的行政决策,亦为王充《论衡》所关注。如《盐铁论·晁错》言“侵削诸侯”事,所谓“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15] (P113-114),竟然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论衡·实知》写道:“高皇帝封吴王,送之,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反者,岂汝邪?’到景帝时,濞与七国通谋反汉。建此言者,或时观气见象,处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见濞之勇,则谓之是。”^[2] (P1070-1071)其事见《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谓曰:‘若状有反相。’心独悔,业已拜,因拊其背,告曰:‘汉后五十年

东南有乱者,岂若邪?然天下同姓为一家也,慎无反!’滯顿首曰:‘不敢。’”裴驷《集解》:“徐广曰:‘汉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驷案:应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东巡以厌气,后刘项起东南,疑当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贮积足用为难,又吴楚世不宾服’。”司马贞《索隐》:“案:应氏之意,以后五十年东南有乱,本是占气者所说,高祖素闻此说,自以前难未弭,恐后灾更生,故说此言,更以戒滯。如淳之说,亦合事理。”^[5](P2821-2822)黄晖《论衡校释》特别指出,王充《论衡》的见解与应劭之说是一致的:“按:应说与仲任义同。”^[2](P1071)王充作为会稽人,对于汉景帝“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以及随后发生的政治史变乱显然是熟知的。

《论衡》记述秦始皇“上会稽”,“望于南海”及“高皇帝封吴王,送之,拊其背”预言“汉后五十年,东南有反者”,而“到景帝时,滯与七国通谋反汉”事,均是会稽人记会稽事。王充熟悉会稽在汉代海洋史上的地位,另一史事也一定会在他的知识构成中形成深刻的印象。这就是汉武帝时代命朱买臣于会稽“治楼船”。《汉书》卷六四上《朱买臣传》:“上拜买臣会稽太守。上谓买臣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今子何如?’买臣顿首辞谢。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须诏书到,军与俱进。”关于“治楼船”,《史记》卷三〇《平淮书》记载:“大修昆明池,列观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这是有关在昆明池操练用楼船的叙说。而就实战用楼船制作的文献记载,仅此《朱买臣传》一例。会稽因此成就了中国古代造船史上的辉煌^①。

三、海“巨大之名”

关于“海”的地理知识,王充似乎有以切身体会为基点的了解。相关信息,在汉代文献中,应以《论衡》最为集中。

《论衡》有诸多论说言及“海”的广阔宏大。《论衡·别通》:“大川相间,小川相属,东流归海,故海大也。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也。不谓之大者,是谓海小于百川也。夫海大于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于不通,莫之能别也。润下作咸水之滋味也。东海水咸,流广大也。西州盐井,源泉深也,人或无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盐井之利乎?不与贤圣通业,望有高世之名,难哉!”^[2](P592)以“海”和“百川”的关系,联系水文与人文,陈说哲理,或比喻学识才俊的聚会,是古诗文中常用的借比方式。而《论衡》所谓“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可能是比较早的使用这种语辞形式的文例。

《论衡·别通》又写道:“东海之中,可食之物,杂糅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气渥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故夫大人之胸怀非一,才高知大,故其于道术无所不包。学士同门,高业之生,众共宗之。何则?知经指深,晓师言多也。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为深,多也。岂徒师门高业之生哉?”其中“夫水精气渥盛”句,黄晖校释:“朱校本元本‘夫’作‘海。’”^[2](P594-595)即据朱宗莱校本,作“海水精气渥盛”。所谓“东海”“精气渥盛”,“生物”“众多奇异”,当然直接来自对海产资源丰盛的认识。说“大人之胸怀”与“高业”“学士”“能博学问”者,可以“东海”之“大”,“海水精气渥盛”相比拟,则借用了海洋广博气势之理解。

我们看到,文士才人之“遇”与“不遇”,是汉代知识人经常思考的人生主题^②。《论衡·逢遇》全篇言“遇不遇”,其中写道:“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贤不贤,才也;遇不遇,时也。才高行洁,不可保以必尊

① 关于会稽“治楼船”,有学者指出,“楼船”军在西汉时期是“远征南方平定封建割据势力的水上武装力量”。见于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造船工业局《造船史话》编写组编写的《造船史话》。金秋鹏认为:“汉朝以楼船为主力的水师已经非常强大。”(《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房仲甫、李二和认为:“汉武帝时,为巩固东南沿海地区的统一,大事扩建楼船军。”(《中国水运史(古代部分)》)

② 《艺文类聚》卷三〇有汉董仲舒《士不遇赋》及汉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艺文类聚》卷二一引刘孝标《辨命论》称之为“史公董相不遇之文”。又《艺文类聚》卷二五引后汉崔寔《答讥》:“观夫人之进趋也,不揣己而干禄,不揆时而要会。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谋大。纤芒毫末,祸亟无外。荣速激电,辱必弥世。”《艺文类聚》卷一引魏文帝《浮云诗》曰:“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惜哉时不遇,忽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

贵；能薄操浊，不可保以必卑贱。或高才洁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浊操，遇，在众上。”^[2]（P1）《论衡·效力》言“文儒之知”，即得到识拔的机会，可以“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时，则以“江”“河”“流通入乎东海”彼此比照：“河发昆仑，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广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东海。如岸狭地仰，沟洫决洪，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于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将援引荐举，亦将弃遗于衡门之下。固安得升陟圣主之庭，论说政事之务乎？”^[2]（P584）“江”“河”虽“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但只有“流通入乎东海”，才相当于“文儒”知识人生的成功。

《论衡·须颂》赞美“汉德”之“盛”，也借用“海”之“广大”为喻：“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浮于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2]（P850-851）海的“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厉难测”成为“汉德酆广，日光海外”的代表性象征。

以“海”喻事，以“海”辨理，是《论衡》的论说习惯，也体现了王充的思维倾向与识见背景。

四、海潮“随月盛衰”说

前引《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关于秦始皇南巡会稽，“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事，《论衡·实知》作“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狭）中度”^[2]（P1071）。“水波恶”即“涛恶”，应当是说海潮。

《论衡·书虚》辩说伍子胥死兴海潮故事：“传书言：吴王夫差杀伍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于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杀人。今时会稽丹徒大江，钱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庙。盖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涛也。夫言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实也；言其恨恚驱水为涛者，虚也。”^[2]（P180-181）关于“吴王杀子胥投之于江”之所在，王充写道：“投于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钱唐浙江，有吴通陵江。或言投于丹徒大江，无涛。欲言投于钱唐浙江，浙江、山阴江、上虞江皆有涛。三江有涛，岂分橐中之体，散置三江中乎？”又说：“吴、越在时，分会稽郡，越治山阴，吴都。今吴，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山阴、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吴之江为涛，当自上（止）吴界中，何为入越之地？怨恚吴王，发怒越江，违失道理，无神之验也。”这样的讨论，体现出对“上虞”地方历史文化的熟悉。

辨正“子胥为涛”事，王充有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说。他写道：“夫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也。血脉流行，汎扬动静，自有节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经曰：‘江、汉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发海中之时，漾驰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2]（P183-185）清人俞思谦指出：“王充《论衡》：海之潮水之溢而汎行者，喻人血脉循环周作上下于支体间。盖随荣卫之气耳。潮之衍漾进退，亦随海之气耳。”^[16]清人王仁俊研究《论衡》，也写道：“夫水也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而为潮。案《海潮论》曰：地浮与大海随气出入上下，地下则沧海之水入于江，谓之潮。地上则江湖之水之沧海，谓之汐。与王充合西人论潮汐为吸力与随气之说略同。”^[17]

王充所谓“其朝夕往来，犹人之呼吸，气出入也”之“朝夕”，其实可以读作“潮汐”。刘盼遂指出：“‘朝夕’即‘潮汐’之古字。”^[2]（P184）《水经注》卷九《淇水》：“浮渚又东北径汉武帝望海台，又东注于海。应劭曰：浮阳县，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来，日再。”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注：“案‘朝夕’，近刻作‘潮汐’。”清赵一清《水经注释》卷九《淇水》即作“潮汐往来”。在后来文献有关海洋水文现象的陈述中，“潮汐往来”是习见语。《越绝书》卷一《外传记吴地传》：“吴古故祠江汉于棠浦东，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汉书》卷五一《枚乘传》记载“枚乘复说吴王”：“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颜师古注：“苏林曰：‘吴以海水朝夕为池也。’”^①《初学记》卷六引应劭《风俗通》：“海，一云朝夕池。”^[18]（P115）又左思《吴都赋》：“造姑苏之高台，临四远而特建，带朝夕之濬池，佩长洲之茂苑。”吕延济

① 《文选》卷三九枚乘《上书重谏吴王》：“游曲台，临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李善注：“苏林曰：以海水朝夕为池。”张铣注：“朝夕池，海也。汉宫池小，故不如也。”

注:“濬,深也。吴有朝夕池,谓潮水朝盈夕虚,因为名焉。”^[4](P108)所谓“朝夕”均为“潮汐”。

王充所谓“气”的说法,使我们联想到汉武帝所谓“会大海气”。《汉书》卷六《武帝纪》记载:“(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夏四月,诏曰:‘朕巡荆扬,辑江淮物,会大海气,以合泰山。上天见象,增修封禅。其赦天下。所幸县毋出今年租赋,赐鳏寡孤独帛,贫穷者粟。’”对于“会大海气”的理解,颜师古注:“郑氏曰:‘会合海神之气,并祭之。’”

对于王充海潮“入三江之中,殆小浅狭,水激沸起,故腾为涛”之说,有学者理解为:“靠海的河流有波涛,是因为受潮汐的影响……”^[19](P231)

王充关于“涛”“潮”之起因与“月”有关的论点,值得海洋学研究者特别重视:“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小大满损不齐同。如子胥为涛,子胥之怒,以月为节也?”^[2](P186)王充《论衡》所谓“发海中”“入三江之中”的“涛”其实“随月盛衰”的判断,是关于海潮发生理论最早的非常明晰的观点。此说关注到月球引潮力的作用。有学者指出,王充对“潮汐”的解释“非常科学、精彩”。他“根据潮汐与月亮相应的事实驳斥伍子胥冤魂为涛的传闻”,“是首先承认客观实际,并用客观实际来判定理论的真假是非”^[20](P542-543)。分析王充之所以能够发现这种“客观实际”也许是必要的。他对于潮汐的观察和理解,应当与滨海生活的实际条件相关。对于海洋水文现象中潮汐的观察和体验,充实了王充的科学意识,提升了《论衡》的文化水准。

有学者认为,王充“是远远超越时代的具备了完整科学精神与气质的最早一个思想家”。论者甚至说:“在王充身上,人们看到一种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21]考察王充所谓“科学精神与气质”,如果以潮汐学为例,其“超前觉醒”的基础,是濒临海洋的生活条件及亲近海洋的文化感觉。

五、磁学原始与“司南”发明

《韩非子·有度》说:“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22](P88)看来“司南”一语出现很早。《论衡·是应》写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有人解释司南之杓:“司南之杓:古代一种辨别方向的仪器,原理和指南针相同,用磁铁制的小勺放在方盘上,勺柄指南。”^[19](P1003)《太平御览》卷七六二引《论衡》:“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柄指南。”《太平御览》卷九四四引《论衡》:“司南之杓,投于地,其柄南指。”^[23](P3382,4192)有学者指出,“‘投之于地’乃‘投之于池’之误。这里的‘池’,指‘流珠池’或‘涸池’,即水银或汞池”^[24](P218)。此说可信。当时“司南”可能还没有应用于海洋航行实践,即在“浮于海者,迷于东西”的情况下定向、定位,但是这种需求必然会促进用以“辨别方向”的技术生成,在航海事业发展较为先进的地方尤其如此。王充对“司南”的关注,或许可以从海洋文化考察的视角认识其意识背景。

所谓“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体现了对地磁感应的早期认识。《论衡·乱龙》还说到“磁石引针”现象:“顿牟掇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他类肖似,不能掇取者,何也?气性异殊,不能相感动也。刘子骏掌雩祭,典土龙事,桓君山亦难以顿牟、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掇针取芥?子骏穷无以应。子骏,汉朝智囊,笔墨渊海,穷无以应者,是事非议误,不得道理实也。”^[2](P695)王充所谓“磁石引针”,可能是关于磁学的最早的比较严肃的文献记录。

有航海史研究者指出,指南针作为“理想的指向仪器”在海上航行中的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发明。“我国是什么时候发明人工磁化方法和制造出指南针的,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现在看来,“最迟在北宋初期就已经发明了人工磁化的方法,并且成功地制造出了指南针”。“在北宋末期,我国已经把指南针作为导航仪器,应用在航海事业中。”“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是我国古代对人类文明进化的极其伟大的贡献”^[25](P147,149,151)。马克思曾经赞扬“指南针”“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之一,“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26](P427)。作为指南针发明之技术基础的“司南之杓”,以及作为指南针发明之理念基础的“磁石引针”等现象的记录见于《论衡》,是对王充文化意识与学术思想进行总结时绝不可以

忽略的。

六、关于“鲸鱼死”

在《论衡·乱龙》篇讨论“顿牟掇芥，磁石引针，皆以其真是，不假他类”之后，王充在论证“天道自然”这一科学主题时，又说到一种海洋生物的生命现象，即“鲸鱼死”：“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2]（P695-696）

中国大陆古代居民对于“鲸鱼”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殷商时代。有学者指出：“关于鲸类，不晚于殷商，人们对它已有认识。安阳殷墟出土的鲸鱼骨即可为证。”^[27]（P348）据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记载，殷墟哺乳动物骨骼发现有：“鲸鱼类 若干大脊椎骨及四肢骨。但均保存破碎，不能详为鉴定。但鲸类遗存之见于殷墟中，乃确切证明安阳动物群之复杂性。有一部，系人工搬运而来也。”^①《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梦与海神战，如人状。问占梦，博士曰：‘水神不可见，以大鱼蛟龙为候。今上祷祠备谨，而有此恶神，当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人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自琅邪北至荣成山，弗见。至之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并海西。”《论衡·纪妖》记述秦始皇最后滨海行程，也说到秦始皇“梦与海神战”及“候神射大鱼”情节：“……明三十七年，梦与海神战，如人状。是何谓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梦与海神战，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鱼，自琅邪至劳、成山不见。至之罘山，还见巨鱼，射杀一鱼，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2]（P922-923）这里所谓“大鱼”“巨鱼”，有人认为就是“鲸鱼”^②。有关“大鱼如山”“死岸上”“膏流九顷”，骨骼可以利用的记载^③，说明沿海人们对“鲸鱼死”的现象是熟悉的。秦汉宫苑仿拟海洋的池沼中，有鲸鱼模型。

关于鲸鱼集中死于海滩这种海洋生物生命现象的明确记载，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献《汉书》卷二七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上》：“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京房《易传》曰：‘海数见巨鱼，邪人进，贤人疏。’”现在看来，关于西汉晚期“北海出大鱼”“东莱平度出大鱼”的记载，是世界最早的关于今人所谓“鲸鱼集体搁浅”“鲸鱼集体自杀”情形的比较明确的历史记录。记载东汉史事的文献也可以看到涉及“出大鱼”的内容。《续汉书·五行志三》“鱼孽”题下写道：“灵帝熹平二年，东莱海出大鱼二枚，长八九丈，高二丈余。明年，中山王畅、任城王博并薨。”刘昭《注补》：“京房《易传》曰：‘海出巨鱼，邪人进，贤人疏。’臣昭谓此占符灵帝之世，巨鱼之出，于是为征，宁独二王之妖也！”《淮南子·天文》关于天文和人文的对应，有“人主之情，上通于天，故诛暴则多飘风，枉法令则多虫螟，杀不辜则国赤地，令不收则多淫雨”语，同时也说到其他自然现象的对应关系，包括“鲸鱼死而彗星出”。《淮南子·览冥》也写道：“东风至而酒湛溢，蚕吐丝而商弦绝，或感之也；画随灰而月运阙，鲸鱼死而彗星出，或动之也。”对于所谓“鲸鱼死”，高诱的解释就是“鲸鱼，大鱼，盖长数里，死于海边”^[3]（P83-84, 195）。《淮南子》“鲸鱼死而彗星出”的说法为纬书所继承，其神秘主义色彩得以进一步渲染。《太平御览》卷七引《春秋考异邮》：“鲸鱼死而彗星出。”注：“《淮南子》亦云。”又《太平御览》卷九三八引《春秋考异邮》曰：“鲸鱼死而彗星出。”《太平御览》卷八七五引《春秋考异邮》作“鲸鱼死彗星合”，宋均注：“鲸鱼，阴物，生于水。今出而死，是时有兵相杀之祥也。故

① 详见《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实业部地质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地质学研究所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印行。此信息之获得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袁靖教授赐示，谨此致谢。

② 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之三：“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又如吴莱《昭华管歌》诗：“临洮举杵送役夫，碣石挟弩射鲸鱼。”

③ 《太平御览》卷九三八引《魏武四时食制》曰：“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丈，谓之鲸鲵。次有如屋者。时死岸上，膏流九顷，其须长一丈，广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碗大，骨可为方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1960年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版“膏流九顷”作“毫流九顷”，“骨可为方臼”作“骨可为矛矜”。

天应之以妖彗也。”^[23](P34,4167,3881)

《论衡·乱龙》所谓“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的判断,否定了以为“鲸鱼死,彗星出”是政治灾异的认识,体现了“天道自然”并不与“人事”必然对应的清醒的认识。这种对“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完全“自然”的感觉,应是建立在熟悉海洋环境的“自然”经验的心理基础之上的^①。

七、“海内”与“四海之内”

《论衡·书虚》写道:“舜之与尧,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内。”^[2](P174)指出先古圣王“尧”“舜”“俱帝”,其执政区域之“共”“同”空间,乃“四海之内”。又《论衡·艺增》:“《论语》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民无能名焉。’”王充写道:“言荡荡,可也;乃欲言民无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无能名尧之德者,殆不实也。”也说“四海”。而《论衡·艺增》又说:“《尚书》‘协和万国’,是美尧德致太平之化,化诸夏并及夷狄也。言协和方外,可也;言万国,增之也。夫唐之与周,俱治五千里内。周时诸侯千七百九十三国,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僂耳、焦侥、跂踵之辈。并合其数,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尽于三千之中矣。而《尚书》云‘万国’,褒增过实,以美尧也。”^[2](P388,381-383)王充澄清儒家经典“美尧”“美尧德”“褒增过实”的宣传时,也涉及“四海”与“万国”对应的语言习惯。

《论衡·谈天》同样指出“儒书”“久远之文”的不合理:“儒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此久远之文,世间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无以非,若非而无以夺,又恐其其实然,不敢正议。以天道人事论之,殆虚言也。与人争为天子,不胜,怒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有力如此,天下无敌。以此之力,与三军战,则士卒蝼蚁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胜之恨,怒触不周之山乎?且坚重莫如山,以万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动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难。使非[天]柱乎?触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复难。信,颛顼与之争,举天下之兵,悉海内之众,不能当也,何不胜之有!”^[2](P469-470)王充在与“儒书”的论辩中用“举天下之兵,悉海内之众”语,“天下”与“海内”对应。这正是汉代政论的语言定式。

“海内”,当时已经成为与“天下”对应的语汇。《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所谓“临制天下,一齐海内”就是典型的例证。当时以大一统理念为基点的政治理想的表达,已经普遍取用涉及海洋的地理概念。政治地理语汇“四海”与“天下”,“海内”与“天下”的同时通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原居民的世界观和文化观中,海洋已经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贾谊《新书·时变》有“威振海内,德从天下”的说法^[28](P96)。《淮南子·要略》:“天下未定,海内未辑……”^[3](P3090)《盐铁论·轻重》可见“天下之富,海内之财”,同书《能言》也以“言满天下,德覆四海”并说。又《世务》也写道:“诚信著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15](P180,459,508)在这种语言形式背后,是社会对海洋的共同关心。“海内”和“天下”形成严整对应关系的文例,《汉书》中即可以看到:“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临制天下,壹齐海内。”“天下少双,海内寡二。”“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海内为一,天下同任。”“海内晏然,天下大洽。”^[6](P3972,2172,2795,2244,2399,2872)这一语言现象,体现了当时中原居民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

《论衡·解除》说:“行尧、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灾消灭,虽不逐疫,鬼不往。行桀、纣之行,海内扰乱,百祸并起,虽日逐疫,疫鬼犹来。”^[2](P1043)是以“天下太平,百灾消灭”与“海内扰乱,百祸并起”形成对照。“天下”与“海内”对仗。《论衡·宣汉》:“今上即命,奉成持满,四海混一,天下定宁。”则以“四海”与

① 《白孔六帖》卷九八引《庄子》曰:“吞舟之鱼失水,则蝼蚁而能制之。”可见相关现象是滨海“自然”观察的经验。《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描述宫苑中仿照海域营造的“太液沧池”所谓“鲸鱼失流而蹉跎”,也并不以这一现象与政治局势相联系,理解为“妖”。张衡著述在王充之后,或许受到王充的影响。

“天下”对应。而《论衡·定贤》：“上赐寿王书曰：子在朕前时，辐辏并至，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2]（P1108）其中“天下少双，海内寡二”语，与前引《汉书》卷六四上《吾丘寿王传》文辞竟然完全相同。

“海”与空间意识、地理认知、世界观念之间的关系，由“四海”“天下”“海内”“天下”的语言定式得以反映。《论衡》是我们考察汉代相关文化现象的一件重要的标本。

八、“海内”“海外”与“裨海”“瀛海”

《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严安上书，回顾秦史的教训：“及至秦王，蚕食天下，并吞战国，称号曰皇帝，主海内之政，坏诸侯之城，销其兵，铸以为钟虡，示不复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战国，逢明天子，人人自以为更生。向使秦缓其刑罚，薄赋敛，省繇役，贵仁义，贱权利，上笃厚，下智巧，变风易俗，化于海内，则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风而循其故俗，为智巧权利者进，笃厚忠信者退；法严政峻，谄谀者众，日闻其美，意广心狭。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将兵以北攻胡，辟地进境，戍于北河，蜚刍挽粟以随其后。又使尉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监禄凿渠运粮，深入越，越人遁逃。旷日持久，粮食绝乏，越人击之，秦兵大败。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陈胜、吴广举陈，武臣、张耳举赵，项梁举吴，田儋举齐，景驹举郢，周市举魏，韩广举燕，穷山通谷豪士并起，不可胜载也。”^[5]（P2958）以兼并“诸侯”称“主海内之政”，而北河南海的进取，即“北攻胡”，“南攻百越”，称“欲肆威海外”。

除“海内”“四海之内”而外，《论衡》也说到“海外”“四海之外”。如前引《论衡·艺增》所谓“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僮耳、焦侥、跂踵之辈”^[2]（P382）。又《论衡·谈天》又言及邹衍学说：“邹衍之书，言天下有九州，《禹贡》之上，所谓九州也。《禹贡》九州，所谓一州也。若《禹贡》以上者，九焉。《禹贡》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东南隅，名曰赤县神州。复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然亦不能实然否，相随观读讽述以谈。故虚实之事，并传世间，真伪不别也。世人惑焉，是以难论。”黄晖校释解说“裨海”：“有裨海环之。《史记·孟子传》《索隐》曰：‘裨海，小海也。’”关于“九州之外，更有瀛海”，黄晖说：“此天地之际。《汉·艺文志·阴阳家》：‘《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封禅书》言其著《终始五德之运》。今并不传。其瀛海神州之说，只见于史迁、桓宽、仲任称引，不知出其何著。然据《史记·孟子传》言其作《终始大圣之篇》，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因而推之及海外，以为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又《盐铁论》云：‘邹子推终始之运，谓中国，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则知其大九州说，出自《邹子·终始》。仲任时，当尚及见之。”^[2]（P473-474）

邹衍学说所谓“每一州者四海环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其实是大略符合现今地理知识的。王充说到邹衍之说的可疑：“案邹子之知不过禹。禹之治洪水，以益为佐。禹主治水，益之记物。极天之广，穷地之长，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国之地，鸟兽草木，金石水土，莫不毕载，不言复有九州。淮南王刘安召术士伍被、左吴之辈，充满宫殿，作道术之书，论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异类之物，外国之怪，列三十五国之异，不言更有九州。邹子行地不若禹、益，闻见不过被、吴，才非圣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高三千五百余里，日月所于辟隐为光明也，其上有玉泉、华池。今自张騫使大夏之后，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谓之虚也。昆仑之高，玉泉、华池，世所共闻，张騫亲行无其实。案《禹贡》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载，不言昆仑山上有玉泉、华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凡事难知，是非难测。”以多家学说对照邹衍所论，以为“虚妄”。尤其引“太史公曰”所谓“今自张騫使大夏之后，穷河源”，以新的海外考察实践收获作为“余不敢言也”的意识基础，尤其值得重视。

然而,王充又有讨论:“极为天中,方今天下在天极之南,则天极北必高多民。《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则天地之极际也。日刺径十里,今从东海之上会稽鄞、鄞,则察日之初出径二尺,尚远之验也。远则东方之地尚多。东方之地尚多,则天极之北,天地广长,不复訾矣。夫如是,邹衍之言未可非。《禹纪》《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指出“邹衍之言”未可否定。王充又写道:“邹衍曰:‘方今天下在地东南,名赤县神州。’天极为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东南,视极当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极南也。以极言之,不在东南。邹衍之言非也。如在东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时,其光宜大。今从东海上察日,及从流沙之地视日,小大同也。相去万里,小大不变,方今天下得地之广,少矣。”所谓“今从东海上察日,及从流沙之地视日,小大同也”,其中前者,应是其居地观察的实际感觉。王充又说:“雒阳,九州之中也。从雒阳北顾,极正在北。东海之上,去雒阳三千里,视极亦在北。推此以度,从流沙之地视极,亦必复在北焉。东海、流沙,九州东、西之际也,相去万里,视极犹在北者,地小居狭,未能辟离极也。日南之郡,去雒且万里。徙民还者,问之,言日中之时,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复南万里,地在日之南。是则去雒阳二万里,乃为日南也。今从雒地察日之去远近,非与极同也,极为远也。今欲北行三万里,未能至极下也。假令之至,是则名为距极下也。以至日南五万里,极北亦五万里也。极北亦五万里,极东、西亦皆五万里焉。东、西十万,南、北十万,相承百万里。邹衍之言:‘天地之间,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时九州,东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万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万五千里,二十二万五千里。如邹衍之书,若谓之多,计度验实,反为少焉。”^[2](P474-480)王充以更广阔的视角观察,竟然得到幅员超过“邹衍之书”的对更广阔的“天下”的认识。

王充的考察包括“从东海之上会稽鄞、鄞”“察日”,“从东海上察日”,应当是亲身所为。又有对于“日南”“徙民还者,问之”的调查,更超越了对于“东海之上”的思考,而至于“复南万里,地在日之南”的南海。王充对于“天下”的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自有局限,然而这种通过海洋考察认识“天下”的方式是值得赞许的。

《论衡·对作》写道:“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2](P1183)可见对邹衍学说的辨析,王充心存批判意识。所谓“心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动机在于求“正是”,斥“浮虚”。其认识路径,是“考之以心,效之以事”,以“证验”求其真实。其实,邹衍的“浮虚”也是相对的。而王充以“海”为考察基本参照的研究方式,不仅地理学者应当重视,也值得海洋史与海洋文化研究者注意。

九、海洋神仙信仰与海洋资源开发

王充《论衡》有关“海”的文字,反映了汉代社会对“海”的多方面的关心。这种关心在精神信仰层面和物质追求层面,都有所表现。

《论衡》有关论辩,透露出与当时社会盛行的海洋神仙信仰的文化继承关系。如《论衡·无形》:“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海外三十五国,有毛民、羽民,羽则翼矣。”^[2](P66-67)《论衡·道虚》言“儒书言: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或说“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及见“能轻举入云中者”“食合梨”,“食合梨之肉”事。“合梨”“合梨”,被解释为“海蚌”^①,应即蛤蜊。徐幹以此作为海产“宝玩”,但是当时人们食用蛤蚌,是可以确定的。宋人夏僎《夏氏尚书详解》卷六《夏书·禹贡》说:“海物,即水族之可食者,所谓麇赢蜃蚶之属是也。”^[29]又如元人吴澄《书纂言》卷二《夏书》:“海物,水族排蜃罗池之类。”^[30]这里所谓“海物”包括各种海洋“水族”。而“蜃”受到共同的重视。汉景帝阳陵陵园内封土东侧外藏坑 K13、K14 和 K16 发掘收获包括多种动物骨骼。有学者介绍了其中

^① 黄晖校释:“按:‘合梨’读作‘蛤梨’。《淮南》作‘蛤梨’。高注:‘海蚌也。’”

K16 和 K14 盗洞中发现的动物骨骼,而所谓“海相的螺和蛤”的出土尤为引人注目。研究者指出,“海洋性动物螺和蛤共计 4 个种 12 个个体,是这批动物骨骼的一大显著特征。”^[31]王充就卢敖故事发表议论:“……且凡能轻举入云中者,饮食与人殊之故也。龙食与蛇异,故其举措与蛇不同。闻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轻,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璽之肉,与庸民同食,无精轻之验,安能纵体而升天?闻食气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气。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气,则不能轻举。”王充又写道:“或时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离众远去,无得道之效,惭于乡里,负于论议,自知以必然之事见责于世,则作夸诞之语,云见一士。其意以为有仙,求之未得,期数未至也。淮南王刘安坐反而死,天下并闻,当时并见,儒书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鸡犬升天者,况卢敖一人之身,独行绝迹之地,空造幽冥之语乎?”^[2](P321-325)卢敖事迹,被指为“夸诞之语”“幽冥之语”,然而也许“夸诞”“幽冥”的神秘故事中,可以透露出当时社会对于“仙”的崇拜。而仙人的神秘光辉,有海色背景。王充所谓“卢敖学道求仙,游乎北海”,使这一故事的文化背景得以明朗。他说:“食精身轻,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璽之肉,与庸民同食,无精轻之验,安能纵体而升天?”大概在王充生活的时代,“食食合璽之肉”,已经是海滨“庸民”饮食等级。但是在汉初或者至于《淮南子》成书时代的社会观念中,这可能是具有一定神秘意味的特殊食品,借此可以获得“精轻之验”,能够进入“轻举入云中”“纵体而升天”的境界。

《论衡·乱龙》还写道:“上古之人有神荼、郁垒者,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居东海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鬼无道理,妄为人祸。荼与郁垒,缚以卢索,执以食虎。”^[2](P699)看来,当时社会信仰世界中“神仙”与“海”的关系,在《论衡》中是有多种表现的。

关于海洋资源开发的经济意义,王充亦曾予以重视。前引《论衡·别通》所谓“东海之中,可食之物,杂糅非一”及“海水精气溼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且与“耕夫多殖嘉谷,谓之上农”^[2](P595)对应之外,《论衡·说日》说到“珠”这种奢侈品的生产:“海外西南有珠树焉,察之是珠,然非鱼中之珠也。”又言“珠树似珠非真珠”^[2](P511)。又《论衡·率性》讨论“《禹贡》曰‘璆琳琅玕’者”时,说到“鱼蚌之珠”^[2](P76)。《论衡·自纪》“珠匿鱼腹”,非“珠师”则“莫能采得”之说^[2](P1195),也值得考察海珠生产方式时注意。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明确说:“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处近海”的空间指示意义十分明确。“珠玑”作为海产,是当时的经济地理常识。《汉书》卷六《武帝纪》说“定越地”后设南海九郡,其中有“珠崖”。关于“珠崖”,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又引张晏曰:“在海中”,“珠崖,言珠若崖矣。”关于汉代采珠生产的较早史料,有扬雄《校猎赋》有关“流离”“珠胎”的著名文句:“方椎夜光之流离,剖明月之珠胎……”颜师古注:“珠在蛤中若怀妊然,故谓之胎也。”《汉书》卷一〇〇上《叙传上》:“……随侯之珠藏于蚌蛤中?”也体现人们对“珠”的生成缘由以及“采珠”的技术方式都是熟悉的。“珠胎”的生动比喻,有孔融所谓“不意双胎,近出老蚌”语^①。

关于“珠”的生产,人们尤熟知“珠还合浦”的故事。其史实基点,即《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孟尝》:“(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阯比境,常通商贩,贸籼粮食。先时宰守并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于交阯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尝到官,革易前敝,求民病利。曾未踰岁,去珠复还,百姓皆反其业,商货流通,称为神明。”^[7](P2473)这是有关南海产珠之海产开发史的明确资料。《论衡》“鱼蚌之珠”与“珠匿鱼腹”说与所谓“珠胎”即“珠在蛤中若怀妊然”以及“珠藏于蚌蛤”等说法稍有误差,然而“海水精气溼盛,故其生物也众多奇异”的意见,却反映了来自海产史的真知。《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裴松之注引《吴书》:“海产明珠,所在为宝。”^[32]

^① 《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孔融与(韦)康父端书:“前日元将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又来,懿性贞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

(P1243)《艺文类聚》卷六一引晋左思《吴都赋》也说到“蚌蛤珠胎”^[33](P1107),都反映王充生活的会稽地方,应当有“海出珠宝”的经济收益。

此外,《论衡·言毒》说到“路畏入南海,鸬鸟生于南,人饮鸬死”^[2](P956),可以理解为“南海”航行艰险的交通史信息^①。而有关“鸬”的言说,也可以看作在博物学初步兴起的文化背景下,王充海洋学知识构成在《论衡》一书中的反映。

王充海洋意识的发生和发育,自有会稽作为滨海地方之海洋文化的背景。全面认识这一背景,应当进行多视角的考察。西汉时期,北起辽东,南至会稽滨海18郡国,占《汉书·地理志》所载“迄于孝平,凡郡国一百三”的17.48%。民户则占全国总数的20.78%至20.88%,人口占全国总数的18.45%至19.33%^②。大致在战国、秦及西汉时期,这一地区的户口密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P82-86)。这正是与当时这一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状况相一致的。秦王朝“使天下蜚刍輓粟,起于黄、颍、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5](P2954),汉武帝时频繁发起远程运输,“千里负担馈粮”,“人徒之费”的调发,往往“东至沧海之郡”^[5](P1421),汉宣帝曾“增海租三倍”^[5](P1141)。秦与西汉王朝对滨海地区的剥夺,体现其经济的相对稳定。陈寅恪在著名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曾经指出,汉时有所谓“滨海地域之学说”。他认为,神仙学说之起源及其道术之传授,必然与滨海地域有关,自东汉顺帝起至北魏太武帝、刘宋文帝时代,凡天师道与政治社会有关者,如黄巾起义、孙恩作乱等,都可以“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凡信仰天师道者,其人家世或本身十分之九与滨海地域有关”。他指出,两晋南北朝时期,“多数之世家其安身立命之秘,遗家训子之传,实为惑世诬民之鬼道”,“溯其信仰之流传多起于滨海地域,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盖二种不同民族之接触,其关于武事之方面者,则多在交通阻塞之点,即山岭险要之地。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湾港之地。”“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35]王充《论衡》的文化创获,应当与这一文化条件有关。陈说“颇疑接受外来之影响”,启示我们的相关思索可以联系丝绸之路史的考察。

参考文献

- [1] 王子今. 秦汉时期的海洋开发与早期海洋学. 社会科学战线, 2013, (7).
- [2] 黄晖. 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 刘文典. 淮南鸿烈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4] 萧统. 六臣注文选. 李善, 吕延济, 刘良, 张铣, 吕向, 李周翰注. 中华书局据商务印书馆影印, 涵芬楼藏宋刊本《四部丛刊》初编版, 1987.
- [5]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6] 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7] 后汉书.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8] 黄瑩, 陈耆卿. 嘉定赤城志遗迹“古城”条. 《台州丛书》本.
- [9] 胡榘, 方万里. 宝庆四明志. 宋刻本.
- [10] 袁康, 吴平. 越绝书. 乐祖谋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11] 国语.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 [12] 王子今. 范蠡“浮海出齐”事迹考//齐鲁文化研究: 第8辑.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09.
- [13] 王子今. 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 文史哲, 2012, (1).
- [14] 王子今. 略论秦始皇的海洋意识. 光明日报, 2012-12-13.
- [15] 盐铁论. 王利器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16] 俞思谦. 海潮辑说: 卷上. 清艺海珠尘本.
- [17] 王仁俊. 格致古微: 卷四. 清光绪王氏家刻本.

①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下说到南海航道的艰险:“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

② 《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载全国户口总数和各郡户口合计数字有出入,故有两种统计结果。

- [18] 徐坚. 初学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19]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 论衡注释.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20] 周桂钿. 王充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21] 朱亚宗. 王充: 近代科学精神的超前觉醒. 求索, 1990, (1).
- [22] 陈奇猷. 韩非子集释.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 [23] 李昉. 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 1960 年 2 月复制重印版.
- [24] 闻人军. 考工司南: 中国古代科学名物论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 [25] 金秋鹏. 中国古代的造船和航海.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
-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7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27] 宋正海. 中国古代海洋学史.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89.
- [28] 贾谊. 新书校注. 阎振益, 锺夏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29] 夏僊. 夏氏尚书详解. 《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 [30] 吴澄. 书纂言.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31] 胡松梅, 杨武站. 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 考古与文物, 2010, (5).
- [32] 陈寿. 三国志. 裴松之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33] 欧阳询. 艺文类聚: 上册. 汪绍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5.
- [34] 王子今. 秦汉区域文化研究.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35]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The Ocean Discussion of “On Balance” and Wang Chong’s Ocean Complex

Wang Ziji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On Balance” is a famous and significant book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 with rich content, broad vision and deep speculation. The content about the ocean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 of Yue peopl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marine development as well as on the marine exploration and early marine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as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discussion of marine meteorological knowledge, ocean hydrology knowledge, and marine life knowledge has opened up a window into our understanding of oceanography in the Han Dynasty. The author of the book—Wang Chong’s marine complex derived from the coastal environment of his birth and long-term residence, as well as from the ocean consciousness that reflects an open mind, enterprising consciousness and practical concept.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arine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cannot ignore the work of “On Balance” or the thought of Wang Chong.

Key words Wang Chong; “On balance”; marine complex; ocean consciousness; ocean culture

■ 收稿日期 2019-04-22

■ 作者简介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国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重庆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北京 100872。

■ 责任编辑 桂 莉